

修路碑记

岳霄

对故乡的眷恋是人类共同而永恒的情感，如席慕容的诗中所写“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，总在月亮的晚上响起，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怅惘，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……”周口的大街小巷贯穿着周口人温暖的生活记忆，无论身在哪里，大家总会怀念记忆中沙颍河的水，家的风景。

2016年，周口市档案局和周口报业传媒集团联合举办《周口历史影像档案展》。在展览中，一幅《皮坊街修路碑记》拓片档案，吸引了很多参观者的目光。时隔两年，依然有好奇的群众来市档案馆咨询，想再看看这份档案。

该档案原碑为周口民间收藏家朱老师的藏品，拓片一份捐赠周口市档案局，一份捐赠周口市博物馆。碑石为青石质地，碑呈长方形，长63厘米，宽51厘米，厚13厘米，全碑字迹雕刻深度2~3毫米，四周刻连贯套叠皮钱样装饰花纹，右上角“皮坊街修路碑记”七个大字清晰可见。由“商水县生员杨作霖撰文，儒童牛恕大书丹”，记载了“清嘉庆十六年”（即1811年）周口商人集资修建沙河两岸皮坊街的前后经过。

该碑的部分字迹由于长期侵蚀已经模糊不清。碑文前半部分写到，“周口为中州巨镇，水陆通衢，尤四方商贾往来而不绝者也”“道路之设，所以便往来、通车马、利行人也”，以及修路募捐者的姓名和募捐金额。意思是说，周口商业繁荣，周口商人看到皮坊街路面被车马碾压得坑洼不平，来往行人不便，就发动各个商户募捐修路，路修成后刻立这块石碑以示纪念。

后半部分附有捐款名单和银两数

目，主要发起人和负责人为“功德者首事”（即董事），监督员“监生马景”，捐款来自70多家商号和个人。大家捐款金额多则万两白银，少则百两白银。其中商号“裕隆兴”捐白银“三万两”，商号“广太发”捐白银“八千两”。

很多年轻人好奇皮坊街在哪？在民国22年（即1933年）《淮阳县志》“周家口地图”中清晰可见周口两河两岸共有街道72条，参照现在的《周口市城区图》，皮坊街位于联通周口分公司以北，科技市场以南的位置。这里居住的个别老居民，在他们的公安局户口信息上依然有皮坊街某某号的门牌登记。

为啥叫皮坊街，这是个怎样的街道？检索文物资料和2015年周口政协《三川记忆——周口市中心城区文化专项规划调研资料汇编》一书，记录明清期间，“周口手工业非常发达，多是一种产品集中于一条街道，人们以产品叫起了街名，如皮坊街、弦坊街、麻线街、笆子街、打铜街、大衣街等。”“康乾盛世，怀庆府桑城一带，买、白、丁、张、穆、刘、拜等姓氏来周家口开皮行，经营皮货。后来，周家口人也学会了做生意，生意昌盛时期竟有皮行30多家，由原来的皮坊街发展到界牌街、丁字街和南永兴街。”

在周口市关帝庙博物馆中，有两块道光十八年（即1838年）碑记，上面记录山陕商人在周口经营皮行2家，和其他杂货行、丝行、鱼米行等数量。

1920年，日本著名的间谍机构东亚同文会编纂出版《支那省别全志》，这是一部绝无仅有的由外国人编撰的中国志书。其中《河南志》记录“物资在周家口集中，其中一部分经沙河运到郟城再

由火车运往各地，一部分顺颍河入淮河而达镇江。是年在周家口成交牛羊皮700万元……”

1936年，国民政府《河南政治月刊》统计“这一年商水属周口镇成立的同业公会有杂货店、船行、鞋帽、京货、竹木、皮行业、汉帮皮庄业等。”

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，周口市皮毛厂是我省重点企业，生产的皮毛服装十分走俏，一度出口。现在界牌街上还有几家做皮货的老店，都是沿袭皮坊街的商业足迹，保持着周口老街道的民风。

白银三万两是多少？检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朝军机处档案记载，“光绪十五年（即1889年）上半年直隶省顺天府、大名府、宣化府的粮价，以谷子、高粱、玉米三种粮食计算，平均每仓石计银一两四钱六分。”一石约相当于现在的125斤，参看现在的粮食价格以3元/公斤计算，一两白银相当于现在的130元。“三万两”相当于现在的390万元，或者说就是1300吨粮食。这笔巨额捐款，就是在现在的捐赠活动里，也是一



曹植、淮阳和鱼山梵呗

范阔杰

我刚到淮阳工作不久，就听说曹植葬在淮阳。因为对八斗名士久存敬仰，便不由增添了几分对淮阳悠久历史的敬畏。

淮阳思陵的由来

南环路西侧，有两座高大的冢子，南边最高的一座就是人们常说的曹植墓——“思陵”。一日闲来无事，与朋友开车过去参观，算作一种怀古与凭吊。那是一座满是盗洞的封土堆，周边是葱郁的麦田，远处有零星的房舍、村落，更衬托得它突兀高大，孤独而苍凉。由于缺乏管理，坟头上长满了荒草和小树。

据《魏志·陈思王植传》记载，太和六年二月（公元232年），《魏明帝》“以陈四县封植为侯，邑三千五百户”。以陈地的富庶和宜于人居的气候条件来看，这个册封比着曹丕流放式的封赐算是非常优渥了，简直就是天上地下。然曹植天生就是一个活在精神世界中的人，生活待遇的改善并没有给他带去安慰，他期望的是在有生之年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，他最大的愿望是被侄子启用。明帝显然不懂叔叔的心事，也许是曹植故意装着不懂，他最终也没有满足曹植的鸿志，只给了他生活的优待、封地的改善。这让曹植“常汲汲无欢，遂发疾瘵，时年四十一。”曹植病逝于被改封陈地当年的十一月，也就是说，曹植真正在淮阳生活的日子，也就是八九个月的样子。曹植死后，获谥号“思王”，所以今天淮阳的这座陵墓，就叫“思陵”。

到了新地方，遇到新史实，我有一个翻资料的习惯。抱出《中国历史大辞典》查阅“思陵”一词，竟发现了这部权威辞书存在的一处明显疏漏。

《中国历史大辞典》“思陵”辞条下，并不包括淮阳的“陈思陵”，注释的是另外两座墓葬：“①宋高宗陵名‘永思陵’，宋人亦以‘思陵’称高宗。②明思宗陵墓。参见十三陵（注释）。”《中国历史大辞典》中注释的两座思陵都是国家级的，即皇帝的陵墓，和淮阳“陈思陵”的墓主有着身份差别，曹植毕竟只是一个诸侯王。但辞条列的名称是“思陵”，而非“帝陵”，单从这一点来说，《中国历史大辞典》采编是有遗漏的，确实有补正的必要。这是后话和建议，我们先回归正题，探究一下“思”到底应是一个怎样的“溢”字，竟如此“抢手”，以至于文才仰止的曹子建都被盖去了历史上应有的风头。

“思陵”辞条中，首先提到的宋高宗，是南宋的开国皇帝赵构。这位活过了81岁的长寿老人，说他毁誉参半都已经是抬举他了。他虽有建立南宋的中兴之功，但任用奸佞金王，残害忠良，卑躬屈膝，对金称臣，伤透了炎黄子孙的心，败坏了我们骨子里的民族自豪感，显非善主。其次辞典中提及的明思宗，就是明朝最后一位亡国皇帝崇祯。他虽还算励精图治，广纳忠谏，但冤杀袁崇焕自毁长城，最终落得个国破家亡，吊死煤山，也绝非什么值得称道的皇帝。只从这两个人的简单生平看，“思”在溢号中，也不是什么好字眼。

古代君主、诸侯、大臣、后妃等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去世后，朝廷都会根据他们的生平事迹与品德修养，对其评定褒贬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盖棺论定地给一个中肯评语，这个评语凝练成几个字，就是“谥号”。赐谥有“溢法”，是件很严肃的事情，宋代学子苏洵有一部《谥法》专著留世，研究的就是这个问题。谥号总的说来，大概可以分为三类。

第一类是美谥，也叫上谥，这是对逝者的充分肯定和褒奖，所用多是含义好听的字，如庄、武、文、张、穆、杨。第二类为平谥，也叫中谥，除了用于对平庸无为者进行评价之外，平谥里还带有很多同情的意味。如“惠”代表的平庸，而怀、悼、哀、殇都有同情怜悯的意思。第三种就是恶谥，也叫下谥，这是一种含有否定、贬义的溢号，所用的字自然都是一些含义比较差的字，如厉、炀、灵、荒。另外，遇到改朝换代时，后朝统治者对前朝皇帝赐谥时，还会用到一些带讥讽意味的字眼，来表达自己的得意之情。曹植的哥哥曹丕，逼迫汉帝刘协将皇位禅让给自己。践祚后，得意之余，刻薄的曹丕还刘协的溢号竟是“孝献帝”，之外顺帝亦同此意。

根据《周公制谥》的解释：“思：道德纯一曰思；大省兆民曰思；外内思慕曰思；追悔前过曰思；不肖兆民曰思；谋惑不曰思；柔能自勉曰思；通明爽直曰思；深虑远道曰思；念终如初曰思；辟土兼国曰思；追悔前曰思。”这些解释中有褒有批，但绝没有贬低侮辱的意思，所以“思”作为溢号应该属于“平溢”范畴。纵观曹植一生，不被斩杀，身后能得此中谥，就已经是很幸运的事情了。因争王位，魏文帝曹丕对曹植恨之人骨，杀他之心都有。只是曹丕死在曹植之前，给曹植赐溢号的是他的儿子魏明帝曹睿。

真不幸中的万幸，“思王”的溢号才不至于让曹植身后太过难堪。

争储位兄弟反目

曹操在东汉末年的历史地位和贡献主要体现在政治和军事上，其次才是文学，曹丕亦是如此。但曹氏父子三人的文学成就还是无愧中国文学史的，只是在文学方面曹植才是扛大梁的泰斗。“玩政治我不行，文学你们都不行，”曹植无愧这种句式的当代俚语。然曹植到死都对政治抱有希望和热情，这与他被荡不羁的文人情怀、善良宽厚的人品性格很不协调，这种两面性也注定了他的一世的悲哀。

有人说曹操在政治上雄才大略，有人说他是乱世枭雄。英雄也好，枭雄也罢，有一点是不容置疑：如果没有令后人瞩目的历史成就，恐怕有关他的褒与贬都不会在历史上长久流传。董卓、袁绍等人，开始都比曹操强大很多，最终却烟消云散，过眼即逝。唯曹操为一代帝业打下了坚实基础。但如此雄才大略之人，在处理家务的时候，居然也没有跳出袁绍的局限，终酿大祸，给家人造成无比的伤痛，不能不说是曹操伟人生中的缺憾。这个悲剧要从立储说起。

曹植生母卞氏为曹操生育四子，曹丕、曹彰、曹植、曹熊（夭折）。曹丕秉性虚伪阴狠，为众兄弟所不容；曹植和善才俊，深受兄弟和曹操喜爱。然根据立嫡立长的宗法制度，立曹丕为储天经地义。曹操偏偏倾向曹植，又迟迟下不了决心。正是曹操的犹豫不决，给两兄弟腾出了巨大的想象空间。一帮利己之徒围绕在兄弟二人左右，密谋策划，拉帮结党，逐渐形成分别以曹丕和曹植为核心的两大政治利益集团。曹植阵营中主要是杨修和丁仪、丁廙兄弟。这些人疯狂的赌徒，把自己的荣华富贵押在帮助主子建功立业上，也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和家族安危押在主子身上。今天我们更多地知道，曹植“相煎何太急”的明世绝叹，却很少有人知道，在争储的过程中曹植亦曾煞费苦心，志在必得。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都让曹丕如芒刺在背，寝食难安。

曹植热衷政治，却没有政治家的深沉、稳重与专注；其醉心权力，又放不下文人的激情、浪漫与放荡，就像痴迷角力竞技的斗士，每每不把增强自己的体力太重回事，失败是注定的。在曹植两次平定酒后失态之后，曹丕对他彻底地失望了，标志性事件就是：曹操毫不犹豫地斩杀杨修。

杨修的小聪明只是曹操杀他的导火索，或者说借口，想要立即平息曹丕、曹植的储位之争，才是曹操开杀戒的真正动机。敌人以为，曹操不过是在用极端的血腥与杀戮警告身边谋士们：他已经不能容忍再有人怂恿、帮助曹植争夺储位了。不久曹操病逝，“文帝（曹丕）即位，诛丁仪、丁廙，并其男口。”没有了曹操的羁绊，曹丕作为政治家的凶险歹毒开始猛烈发酵。其后，曹丕对曹植极尽迫害之能也就在所难免了。

曹植与鱼山梵呗

佛教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原地区的？史乘中普遍认可的是：佛教于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原。正史《魏书·释老志》中记载：汉明帝夜梦金人。第二天朝堂上，大臣傅毅释称：明帝梦见的是佛陀。于是明帝派西取取经，用白马驮回，便有了洛阳白马寺，也就开了皇家佛教信仰的先河。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段史实，还可以得出一个更大胆的结论：一个大臣能为皇帝以佛释梦，说明佛教在中原民间早已开始传播了。信徒就包括那位向皇帝“弘法”的大臣——傅毅。

梁启超在《中国佛法兴衰沿革》中论断：“计自西历纪元一世纪之初，至四世纪之初约三百年间，佛教渐渐输入中国，且分布于各地。然其在社会上势力极微薄，士大夫殆不知有此事。…佛法确立，实自东晋。”梁先生的话大抵是主流观点，但论断“佛法确立，实自东晋”之前“士大夫殆不知此事”的结论，偏颇欠察也是明显的。前文中那位大臣傅毅就是个例子，还有一个更有力的证据就是——陈思王曹植。

曹植生于西历192年，那时佛教传

笔不小的善举了。

200年前，为当时的修路人和捐助人立碑，大概就是为了让我们记得他们，也让自己深深印刻在周口的历史轨迹里。这幅碑记对研究清朝时期周家口社会经济活动、周口城区街道变迁、周口清代经济的发展，都具有较高的档案和考古价值。

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高度重视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，指出“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，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。”“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，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。”

周口历史文化底蕴深厚，本土文化资源丰富，随着城区建设，众多的老街道消失或改变，街名成为了字符。如何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城市的历史记忆、文化基因，是每个周口人关心的问题。今天，我们档案人珍存每一份关于周口的档案，更欢迎越来越多的周口人将关于周口的档案捐赠给我们，共同保护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，守护我们共同的家。

入中原刚百余年。但曹植不仅接触到了佛教，研读了佛经，而且还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启蒙了一项重要佛家礼仪，即汉化梵呗。

曹丕践祚后，折磨曹植的办法之一就是流放式的封赏！哪贫瘠，哪荒凉，就把心怀浪漫的弟弟封到哪里，且等他经营几年，环境稍有改善后，再次改封他乡。魏太和三年，几经颠沛流离的曹植最后被哥哥封为东阿王，由雍丘（今河南杞县）迁往东阿。

鱼山是一座只有八十多米高的石山，位于东阿县城东南20公里处。因山形似甲鱼，山顶建有渔妇庙而得名。这里南临黄河，远倚泰山，可以称得上风光旖旎。当然曹植游历鱼山的时候，南边的河流并不是今天的黄河，而是济水。济水，古河名，发端于河南省济源市的大行山中。（《尔雅·释水》将济水与黄河、淮河、长江，并称远古中国之“四渎”，即四条入海大河的意思。宋金时期，黄河决堤泛滥，肆虐的黄河洪水抢占济水河道入海，济水便消失了。今天只留下济源、济宁、济南等古地名，算作对这条古代大河的一种铭记。

鱼山松风如吟，济水波浪如歌，鸟语虫鸣，月流似瀑。曹植静居其间，超然物外，宠辱皆忘，其内心的愉悦是可以想见的。这正契合了“万行无常，诸法无我”的佛教无上境界。所以，即便我们无法知道曹植是怎么接触到佛教的，但是他和佛教经典一拍即合的默契是一定的。梁启超先生认为：“三国时，刘蜀佛教无闻，曹魏稍翻有经典”。确如此言，曹植当时看到了一部佛教经文《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》。

诗人的敏感和佛教的禅思，文人的才情和佛学的玄妙，开始在曹植的胸中碰撞、融合。这种碰撞和融合，如果遇到的是木讷愚钝的凡夫俗子，或玲珑剔透的文人学士，也就是造就一个虔诚的佛教徒，或大德高僧而已，偏偏他是曹植，好在他是曹植。于是汉传佛教中一种新的唱诵仪式，在鱼山滥觞，在曹子建横溢的才华中流淌肇始，那就是梵呗。曹植也因此成为中国梵呗音乐的创始人。曹植在陈州歇息了！

他浪漫的话世生活，他伟大的文学创作，他矛盾的理想情怀，皆停歇于斯。有人说，淮阳思陵只是他的衣冠冢，并非归寝之地；有人说，他的后人按照他的遗嘱，将他葬鱼山，那是一个让他和佛教水乳交融的地方；还有人说他葬在通许，那里靠近其父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许昌。其实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曾到过哪里？一个近两千年前的杰出人物走过的地方，都会因他的足迹而载入史册，显现出在往昔岁月中非凡的历史地位。



铜锅铜碗的游乡来

王天瑞

豫东地区的广大老百姓，很勤劳、能吃苦，很勤俭、会节约。也许，有人会说，他们过惯了苦日子。而我说，他们过苦日子的时候，很勤劳、能吃苦，很勤俭、会节约。只要他们过苦日子的时候，同样很勤劳、能吃苦，很勤俭、会节约。这是豫东人的传统美德，这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

我们的前辈，我们的豫东人，很会过日子。他们对坏了的锅、碗、盆、缸，总是想办法修修，继续使用，实在不能修了再扔掉。只要能修的，就不会扔掉，而是先把它放起来，当有了铜锅匠，便把它拿出来，请铜锅匠修修，修好了继续用。于是，社会上随之诞生了铜锅、铜碗、铜盆、铜缸的手艺，也诞生了手艺高超的铜锅匠。

铜锅匠，有人叫他铜锅的，有人叫他铜碗的，有人叫他铜盆的，有人叫他铜缸的，但大多数人都叫他“铜锅的”。至于他是哪村哪店的、姓啥名谁，却无人问津。只有一些老年人才叫铜锅的或赵师傅或钱师傅或孙师傅。当然，铜锅的也有很特别的行头。你看，说着说着铜锅的赵师傅来了。他，肩上挑着一副担子，担子两头是两个木箱，其中一个大箱的下半部分是个风箱，上半部分是个可以点火加热融化钢铁的火炉，扁担头上挂一面小铜锣和一个小铁球。担子另一头的箱子则是几层抽屉，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工具和大大小小的铜铁铆钉。他走在大街上，担子有时一摇一摆，有时忽闪忽闪，于是，小铜锣和小铁球就有节奏地碰撞，发出很有节奏的丁丁当当的声音。同时，他还以怪怪的腔调吆喝着：“铜锅来！”“铜碗哎！”“铜盆哎！”“铜缸哎！”“铜锅、铜碗、铜盆、铜缸哩！”他看到有人拿着锅、碗、盆、缸来，就把扁担放下，准备开张营业。于是，他拿出工具，摆在地上：锤子、剪子、铜钉、铁丝、铜丝、钻杆、钻头、腻子……

铜锅与铜碗、铜盆、铜缸的工艺是一样的，或者说大同小异。一个好的铜锅匠，大都是把这几样锅活一肩挑。铜的过程是，首先，根据接缝的长短和形态，判定要把接缝固定结实需要打上几个铜子。铜子，又叫铜钉、扒钉、扒铜、扒铜子。铜子，有大有小。铜子，有铁、有铜。铜子，形状像个四四方方的“口”字切成两个半。其次，在接缝的两边钻出两个两个对称的小眼，把铜子的两腿插进小眼里，用锤子轻轻地砸牢靠。最后，在接缝处抹上白色腻子，接缝也就不再漏水了。有一首小诗写道：“穿街走巷喊声扬，铜锅铜碗铜盆缸；钻眼钉箍灰抹缝，翻新补旧美如常。”这，岂不就是乡村铜匠的真实写照吗？

赵师傅还给我讲过这么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，多年后我还在一本书上看到过。说，一位老太太来修锅，一个铜子一角钱，这个碗要用10个铜子才能修好。铜匠说，老太太，花一元钱你就能买个新碗，我看还是别修了。老太太说，我吃饭都用这个家伙，儿子规定我一顿只能吃一碗，我的这个碗大，还能吃饱，现在的新碗小，要换成新碗，我就吃不饱了，只能饿着。铜匠一听，二话没说，立马把碗修好，一分钱不要。看，这是多么高尚的职业道德！

现如今，虽然这种铜锅、铜碗、铜盆、铜缸的手艺已经绝迹了，但我祝福，勤俭节约的美德永远发扬光大！

品味乡愁



继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
繁荣发展周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

周口文化

投稿邮箱: zkwhzk@126.com
新闻热线: 0394-8599519